

关于文学流派的讨论

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
山西日报编辑部 编

编 者 的 话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十四日，《山西日报》上开辟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学流派的讨论》专栏，重点对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有关问题，进行了争鸣和探讨，受到了文艺界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在省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全国各地有关单位和部分读者纷纷来信，要求提供资料。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和《山西日报》编辑部，将已在报上发表的这方面的文章收集编印成册，并将一九七九年十一、十二月间开展的《你对〈老二黑离婚〉怎么看》的一些讨论文章附后，供大家参阅。

目 录

《赵树理文集》序	周扬 (1)
《赵树理文集》跋	康濯 (3)
编者按	(8)
且说“山药蛋派”	李国涛 (9)
“山药蛋派”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客观条件	
.....	刘福林 (15)
“山药蛋派”有鲜明特色和发展前景	
.....	汪远平 (8)
“山药蛋派”的形成与特色	曲润海 (21)
文学流派岂能扶植	李 毅 (24)
开掘民间文学有好处	王莲葆 (26)
通俗化是民族风格, 不是权宜之计	程继田 (27)
农民同样需要真正的艺术	成 一 (31)
现在还有多少农民喜欢“山药蛋派”	
.....	曾征远 (34)
具有民族风格的文学定将日益昌盛	田 奇 (36)
保守是没有出路的	薄子涛 (39)
“山药蛋派”在提高	黄立新 (41)
“山药蛋派”不是越土越好	姚勇 李良 (42)
工人爱读“山药蛋派”作品	荣 索 (43)

从“赵树理风格”看“山药蛋派”的今昔	方浴晓 (44)
从《李有才之死》谈“山药蛋派”的风格	金晴太 (47)
扶持流派 发扬风格	马保山 (49)
乡土气息永远需要	王卫国 (51)
时代·风格·流派	郭六喜 (52)
从“山药蛋派”的“土气”谈起	韩文洲 (53)
文学艺术应该有地方特色	何玉麟 (56)
现在是该提倡“阳春白雪”的时候了	吕振国 (58)
现实主义是“山蛋派”的重要特色	张仁健 (60)
众派纷争 互相竞赛	贾德民 (63)
从“问题小说”看时代风貌	吴佩光 (65)
扬长弃短 才能发展	冀培根 (67)
愿“山药蛋派”在提高中发展	丹保安 杨晓国 (68)
发展“山药蛋派”的内在因素和动力	李福江 (70)
“山药蛋派”应该开拓新题材	侯修文 (72)
“山药蛋派”的出路在于踢开旧框框	郭冬季 (74)
作家不要城市化	张来弟 (75)
精工妙笔创新篇	董白先 (76)

发展文学流派 促进百花齐放·····	白修文 (77)
有偏爱, 不要有偏心·····	王之元 (80)
多发展农村题材的作品有什么不好·····	毛协福 (81)
善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庞 礴 (82)
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历史贡献和时代局限 ·····	刘再复 (84)
关于“山药蛋派”的基本艺术特色·····	武世统 (93)
新形势向“山药蛋派”提出了新问题 ·····	刘锡诚 (98)
传统要发扬 特征不可失·····	黄修己 (104)
文艺理论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郑 笃 (110)
编 后·····	(118)
附: 你对《老二黑离婚》怎么看?	
编者按·····	(119)
《老二黑离婚》挺有意思·····	白修文 (119)
《老二黑离婚》不够真实·····	卉 石 (122)
老二黑的性格不象小二黑·····	马顺升 (124)
艺术真实不是照搬生活·····	戈 佳 (126)
小二黑可以变成老二黑·····	卢 昆 (129)
对老二黑性格塑造的一点浅见·····	贾明生 (132)
也谈真实·····	章 顺 (137)
热心、匠心及续篇·····	陈世杰 (139)
老二黑可以不象小二黑·····	陈建祖 (142)
什么是老二黑性格的主要特征·····	董大中 (144)

老二黑的个性为啥不鲜明	尽 染 (146)
不能丢开环境着人物	赵宝贵 王福生 (148)
独特的风格感染人	王瑞兴 (150)
耳边汾水哗哗响	金晴太 (152)
有成功的一面 也有不足的地方	林 零 (154)
可喜的起步 漫长的路程	吴佩光 王之元 (156)
读《老二黑离婚》想起的	赵广建 (161)
喜闻“土豆”泥香味	郭进栓 郭 超 (164)
我怎么想起写《老二黑离婚》	潘保安 (166)
活跃文艺评论 繁荣文艺创作	郑 笃 (170)

《赵树理文集》序

周扬

工人出版社和山西大学合作编辑出版《赵树理文集》，要我写几句话，并希望将我一九四六年写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作为前言。我那篇旧作，作为对赵树理同志创作的全面评价，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他后来还继续写了许多出色的作品。我写那篇文章时，和这位在文坛初露头角的新星还不相识，只是对他作品的新颖题材和独特风格以及作者的卓越才能感到惊异。全国解放后，我才认识赵树理同志。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每读他的作品总有一种亲切之感。文如其人。他文好人也好，文章有特色，人也有特色。他最熟悉农村，最了解农民心理；他懂世故，但又象农民一样纯朴；他憨直而又机智诙谐；他有独到之见，也有偏激之词；他的才华不外露，而是象藏在深处的珠宝一样不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我喜爱他的为人，甚至对他的某些偏见，也能谅解。他公正无私，对人民忠心耿耿，这是最可贵的。

我没有把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全部读完，过去读过的，有的至今记忆犹新，有的就印象淡漠了。对他作品的全面的正确的评价，就让那些有专门研究的同志或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专家们去作吧！凡是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总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我同意重新发表我的那篇旧文章，为的是纪念我们多年

的文字之交和革命友谊。至于那篇文章本身，现在重新来读，说得并不充分，也不深刻。记得当时就有人说过，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而我的文章却没有着重指出这点，是一个不足之处。

一九五九年，我们党内发生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赵树理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曾为此受到了一些同志对他的不公正的批判，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耿耿于怀，同批判过他的同志还是和睦相处。一九六二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的讨论农村题材的创作座谈会上，我曾为此称赞了赵树理同志这种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同志的态度。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赵树理同志就没有能够逃过这一关，终于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就在他遭受残酷折磨，面临死亡威胁的危急时刻，他没有屈服，对革命仍然充满了信心。他在被批斗和监禁的日子里，偷偷地用破纸片写了毛主席的《咏梅》词，以表示他对革命的信念和对党对领袖的一片忠心。他嘱咐他的爱女赵广建同志将这一有他绝笔手迹的纸片设法送到我的手中。那时我早已失去自由，我的命运处于危如垒卵的境地。但他还是信任同志，信任我们之间的友谊，相信我们总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相信人民总会重过光明的日子。赵树理同志的信心，也就是我们每个革命者的信念，现在终于实现了。今天，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除了更加紧密团结，更加勇气百倍工作和斗争以外，还能说什么呢！

一九八〇年四月五日

《赵树理文集》跋

康濯

今年九月二十三日，是赵树理同志逝世十周年。

由工人出版社和山西大学合编的《赵树理文集》，正好也将出版问世。这是对赵树理同志十年忌日的最好的纪念。周扬同志为《文集》写了热情、真挚的序，对老赵的为人和作品做了确切而深刻的高度评价、赞扬和肯定。出版社还为《文集》写了说明，作了注释，介绍了编辑过程中的有关情况：比如从作者存稿中找到并编入了若干珍贵稿件，象已发表、未写完的儿童中篇小说《刘二和与王继圣》中部分未发表的续稿；也编入了“王甲士”、“何化鲁”等笔名发表的几篇文章，和搜集到的部分信札。这当然都是纪念和研究赵树理同志的重要资料。由于我是出版《文集》的最早建议者之一，编辑过程中又提供过若干情况和意见，出版社也要我为《文集》写几句跋。我和赵树理同志虽有较深的友谊，但限于自己的水平，对其人其文的认识和理解并不深，除了在别的文章中写过一点怀念之情，已很难再写出有分量的话。现就老赵和人民的关系，补谈一点个人的粗浅体会。

赵树理同志毕生对党和人民一片忠心，特别是对农民更极其关怀、爱护和尊重，也极其了解；对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更了如指掌。进城以后，往往是任何事物也都要联系到农民头上。买一块手表，他默算一下，说：“够农民买五头驴呢！这是五驴表。”一本小说拿了稿费，也要算算够不够买

抽水机。这习惯，曾使人感到过未免偏激和过分狭隘；然而相处一久，就会体察到他对劳动人民一腔火热的情意。因此，家乡的干部每找他协助集体买机器，他总是解囊相助。家乡亲友找他解决个人生活上的困难，要三十元，他总拿五十，为此并向我说明过：“人家找我开口不容易，总要替我着想，把自己克紧一些嘛！”赵树理和劳动人民之间的感情，深深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勤劳、善良和补实的优美品格。

这种品格同样表现在他的创作上。有的同志知道，赵树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所写，不过生活中的小二黑是被封建势力迫害致死，艺术作品里的小二黑则争得了欢乐和胜利的结局。我曾问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他说：“要把小二黑写死，我不忍。在抗日战争中解放区的艰苦环境里，要鼓舞人民的斗志，也不应该把小二黑写死。”但另一方面，在同一小说特别在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和另外一些作品里，赵树理又曾以他在生活中深刻的洞察和思想上勇敢的胆识，尖锐揭露了解放区农村个别基层党政组织的严重不纯，有的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人，或是披了画皮的恶霸地主；然而即使如此，这些作品却从没使人感到过任何的灰色和消极，倒还总是光明朗朗，直至胜利，赵树理同志就是这样嫉恶如仇而对自己人则尽情地歌颂，这更反映了他同人民之间亲切关系的至为深厚。

正是这种至深至亲的关系，才使得赵树理在我们文学中能够最早地并且一贯地敢于和善于大胆、尖锐揭露和批评我们队伍中的阴暗和落后，而同时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写下的这类作品，倒更其充满鼓舞革命斗志的力量；解放后在一九五八年一片大跃进声中写的这类作品《锻炼锻炼》，尽管当时曾遭到一些同志认为“不合时宜”的误解，但随着时

间的流走，在今天反而愈见其引人的光辉。至于赵树理整个创作当然决不是止于揭露的，从革命现实主义来说，暴露、批评和歌颂本来就是任何事物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老赵的作品有的虽偏于暴露或批评，更多的则主要是歌颂。特别在六十年代初期党和人民正努力克服三年暂时困难之际，赵树理写了衷心歌颂革命实干精神的《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福》等小说，对当时的文学和读者都影响极为深刻。可见赵树理创作上不论歌颂和暴露、批评，都是从自己同人民至亲至厚的感情出发，严格遵循着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这在今天和今后，显然都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赵树理同志在艺术上的追求和实践，也是从他与人民至亲至厚的关系出发的。在青年时期，他曾把当时某些新文学作品称为“交换文学”，意思是指不注意大众化通俗化的作品只能在文学工作者之间交换看看，而不能为广大群众特别是为农民所接受。这种看法虽然未免偏颇，但其心意怕也未可厚非。他在艺术上毕生追求和实践的，也正是怎样使自己的作品能够更好地为尽可能多的读者、特别是农村读者所接受。为此他曾长期地刻苦学习和汲取我国古典文学传统、特别是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包括评书的传统；并从长期的实践中创造了为自己所独有、为我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村读者所喜闻乐见而饱含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小说创作中新的民族形式、风格和技巧。赵树理小说创作中这一富有民族传统而又独自有所创新的特色，或可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新颖的题材，深沉的思想，典型的人物，鲜明的个性，完整的故事，生动的情节，逼真的细节。
浓郁的民族、农民的生活色彩、格调、理想和精神气质，纯朴、敦厚、机智、诙谐的乐观和幽默情怀。

高度提炼得纯真、干净、朴质的群众语言，简洁、利落、朗朗上口的文字，不论叙述、描写和人物对话全都自然地运用群众的语言和精炼的文字，避免生僻的方言土语，但也不拒绝个别常用的文言字眼和语汇，总是以叙述为主，从叙述中展开描写；不是描写为主而夹以叙述，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小说文体和表现手法。

所有这些特色，没有哪一点能够稍稍离开人民生活 and 农村生活的根基，没有哪一点不是发源于作者同农民至亲至厚的感情深处，也没有哪一点不是浸透着革命现实主义的光芒。这些独有的特色还以其迷人的魅力而深深影响了我国部分作家和一代文风。目前文艺界和赵树理家乡山西的报刊上，就正在展开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即所谓“山西蛋派”的讨论。可能这一点是赵树理自己始料所不及，因为他在生活于革命根据地以来的几十年中，并不只专注于自己所写大量小说、剧本、曲艺以及论文、杂文等作品，而是同时还做了大量的减租、土改、办社、整社、生产等工作；况且后一方面的工作虽然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不竭的原料，但他自己却往往是把那些工作的效果看得比创作的影响还重要，并因而在几十年中又写下过不少对农村各方面工作的种种书面建议和理论探讨文字，直到他身后劫余的文稿、纸片中也还有这类文字的。尽管这类文字大都没收入《文集》之中，但其事实本身不也正说明了赵树理创作源泉的深厚，正说明了同人民之间特别是同广大农民之间密切关系的至亲至厚么！

赵树理本来就出身于农民，他的卓越才能当然也主要来自农村的深泥厚土；他和他的作品也恰如一位朴素的老农那样，看来不大才华外露和激情洋溢，实际则是寓热烈于冷静

深思的“内里秀”。这又使得他在群众之中，特别是广大的农村读者之中，同样如一位朴实的、杰出的老农而赢得了深深的喜爱，读者中甚至还流传着一些关于他的为人、行状乃至种种或有或无的轶事。至于他的作品对读者至少有一点也和《水浒》、《红楼梦》这些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一样，不论翻开那一篇、哪一页并从不论其中的哪一段往下读，虽说无头无脑，却照样能很快被吸引而顺畅地读下去。这些情况，在我国现代作家中显然都是少有的。

不过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毁灭之灾，赵树理的作品近年间在部分青年中已比较陌生；文艺界的评论和研究同样不够，和他在中外读者中以及文学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称。因而目前出版《赵树理文集》，便愈见其必要。这对于更进一步拨乱反正，促进新时期文艺的日益繁荣，显然将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作家们在目前深入我国广阔的农村，深入对革命贡献巨大和在现代化建设中位置极其重要的农村，继承我国新文学历来重视反映农村、也善于描写农村的优良传统，更多地深刻描画当前我国农村在党的一系列政策鼓舞下，被林彪、“四人帮”搞得多灾多难后已变化急剧，新生力量从艰苦斗争中战胜腐朽、落后力量的动人风貌不断涌现，新长征的步伐也日益坚实的种种情景，从而克服当前文学中反映农村生活比起来较少的不正常现象，意义更将尤为深远。而做到这一点，显然正是同人民情感至深的赵树理同志毕生的理想，也会是使他感到欣慰而安然瞩目的。

一九八〇年七月五日于长沙

编者按 在一九八〇年四月召开的山西省第四次文代会期间，许多搞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工作的代表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流派都很关心，并联系我省的创作实践，初步讨论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的几个问题。大家建议开展这个问题的讨论，这对活跃文艺评论，指导创作实践，都是很必要的。为此，山西日报开辟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学流派的讨论》专栏。

这次讨论，大体围绕了这么几个问题：“山药蛋派”的风格和特色究竟是什么？“山药蛋派”能不能继续发展、进一步提高？如何使各种文学流派都能自由发展、互相竞赛？此外，还探讨了其他一些有关问题。讨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共同探讨坚持“双百”方针与发展文学流派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学习国内外文学经验与发扬民族风格、地方特色的关系，更好地理解继承文学遗产与推陈出新、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关系，并希望各种不同风格和特色的文学流派，都能在社会主义文学园地里百花争艳，各放异彩。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促进四化建设，反映时代风貌，向着新的文学艺术高峰迈进！

且说“山药蛋派”

李国涛

只要有文学，就会有文学风格。这是由于文学创作这种个体精神劳动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不管有没有人倡导，不管有没有人组织，不管有没有理论上的支持，作家个人的艺术风格总是存在的。在过去的时代如此，在社会主义时代也是如此。

但是，在文学流派上就不完全如此了。由于我们过去政治生活中的某些不正常的影响，人们不愿谈“派”。宗派、右派、反动派、走资派，都无好下场；而艺术流派也算一“派”令人望而生畏。作家们也不大愿意被别人称为某一派。

因此，三十年来虽然我们的理论文章也常把艺术风格和艺术流派并提，但具体分析某位作家的风格者有之，而具体谈一个文学流派者，却罕见。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要讲风格，也要讲流派。因为这是百花争艳的体现。

在社会主义文学中是存在着不同的文学流派的，这需要作具体的研究。我认为，以赵树理为开创者的山西作家群，就是其中的一个。用“山西作家群”这样的概念似乎不很准确，因为流派固然可以以某地作标志，如宋代的江西诗派、清代的桐城派，但现在以一省之大，作家众多，这种概念就显得不恰当。过去人们在口头上曾把山西的这个流派称为

“山药蛋派”。为什么称“山药蛋派”？这是结合着山西在生产上和生活中的特点，又针对这批作家深深扎根于农村生活，作品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这些特点而命名的。

文学流派由风格相近的作家形成。“山药蛋派”以赵树理为首，其中主要的作家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这是一批土生土长的山西作家。赵树理是在太行山区成长起来的，他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长期从事文学通俗化工作。他开始文学创作较早，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不久，他就写了《小二黑结婚》，成为开创一个文学新时期的代表作。赵树理的作品当时在解放区风行，影响很大。山西的其他作家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进行文学活动的。解放以后，有一段时期，他在北京工作，每年有一段时间到晋东南生活。从一九六四年开始，赵树理调回山西，长期生活在晋东南。马烽、西戎等几位作家都是在晋绥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年龄、经历、艺术教养和写作经历都大体相仿。他们都是在《讲话》发表以后开始文学创作的，直至建国以前都在晋绥地区作新闻、文化工作。这批作家在建国初期分散到全国各地，到五十年代中期，都先后回到山西工作，长期深入农村生活。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巧合：五十年代中期，一批刚刚成熟的山西作家不约而同地回到山西老家，回到自己熟悉的农村，去描写农村生活。在这个巧合的背后，可以看到一点共同的东西，就是，这批作家是依恋自己熟悉的生活，决心长期深入这个生活，努力去表现这个生活。于是，这批作家都进入创作丰收的年代。他们的较有特色、较有影响的作品，就是在这以后的十年中写成的。除了赵树理的中篇《三里湾》和许多短篇外，马烽发表了

《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发表了《灯芯绒》、《赖大嫂》；束为发表了《好人田木瓜》；孙谦发表了《伤疤的故事》；胡正发表了长篇《汾水长流》和短篇《七月古庙会》。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村生活，热情地歌颂了新生事物，鞭撻了腐朽的力量，批评了遗留在劳动人民身上的落后思想。请看：一个作家群，写出一批较有影响的以短篇小说为主的作品，比较集中地在刊物上发表出来，这时，即五十年代后期，便出现了“山药蛋派”的称呼。我认为，那时候，一个文学流派开始形成，不过从来没有人正式地予以研究、予以评论罢了。）

＜“山药蛋派”的形成在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如再向前推到四十年代中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个流派的渊源。一九四二年以后，赵树理首先发表一批具有浓厚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的作品，晋东南农村风貌宛然如画，人物跃然欲出。当时在晋绥地区的马烽等人也沿着这条路进行创作。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西戎的《谁害的》、束为的《红契》都具有这种特色。这是学习赵树理的艺术风格，不过这也是当时解放区大批作家自觉地按照毛主席《讲话》的精神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群众化、民族化的要求，当时战争环境的要求，使他们接受了这样的习作锻炼，这对他们个人风格的形成，对“山药蛋派”的形成，都有明显的影响。当时在抗日根据地，文学创作必须向广大工农兵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动员人民奋起斗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文学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由于工农群众文化程度低，文学作品必须适应这个特点，都要通俗化。（马烽等人都有这种经历：写出文章后先到工农中去读给他们听，听不懂当然不行，听懂了觉得不生动、不对味，也不行。那就要修改，要重写。他们接受